

# 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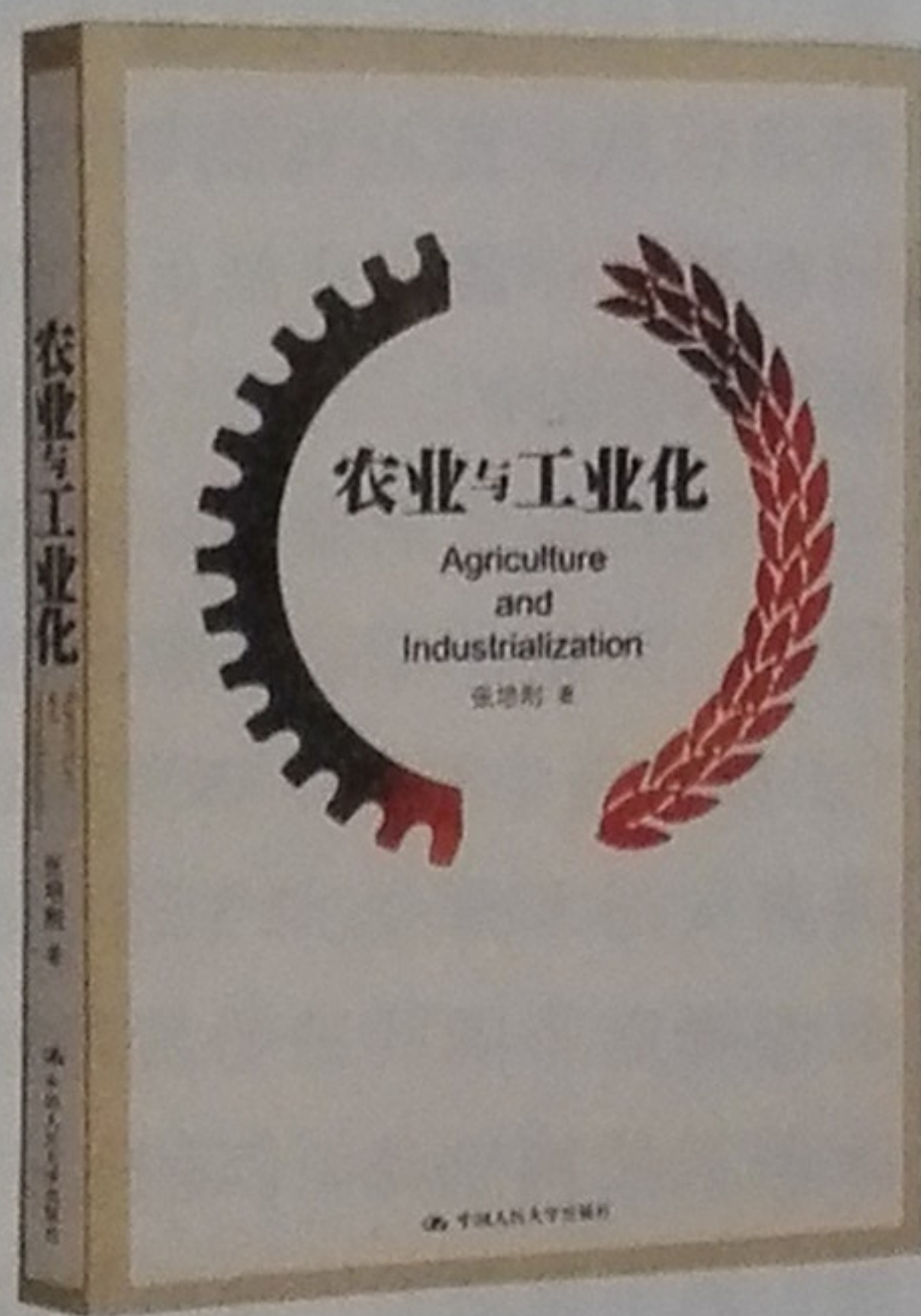
——再读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

中国近30多年来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和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历程，  
无疑再次证明了张培刚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历久弥新的发展经济学经典之作

史晋川 | 浙江大学教授



风华正茂的张培刚先生。



书名：《农业与工业化》

作者：张培刚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

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自194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初版问世，至今已有68年了，期间也曾出版过多种语言的版本，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吾生已晚，1982年初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在学习发展经济学专题课程时，开始接触到培刚先生的这部著作；1998年在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温州模式研究”时，重新捧起培刚先生的著作，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获益良多。2006年，承蒙张培刚先生的厚爱，我有幸和何炼成老师与林毅夫教授共同荣获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奖作品正是《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再版推出《农业与工业化》之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中国近30多年来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和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历程，

无疑再次证明了张培刚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历久弥新的发展经济学经典之作。

在长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我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把经济发展问题还原成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动态过程。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发展，可以发现，经济发展表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具体表现为资源从以农业为代表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持续转移；二是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具体表现为资源及资源配置活动从乡村向城市这类更具区位优势空间的不断集聚。前者就是《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所研究的主题“农业国的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后者就是培刚先生在书中谈到研究工业化的区位理论分析方法时，所说的不同历史阶段“基本区位”的变迁，即“以农业为主的区位形态”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区位形态”，也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城市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和城市化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正如培刚先生数十年后在总结自己的经济发展思想时所说：“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当然，培刚先生的这番话还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即广义的工业化也包含了通常人们所说的城市化。

张培刚先生后来在谈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来龙去脉时，曾经提到，他于1945年冬在哈佛大学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1946年曾在当时的中国资源委员会纽约办事处工作了半年，期间结识了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库兹涅茨教授当时仔细阅读了《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底稿，还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创建者的库兹涅茨教

授，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中提出，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页）。除了阐释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在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库兹涅茨、加塔克和英格森等著名学者，所阐述的农业对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产品、市场、要素、外汇），同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所提出的农业对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五大贡献”（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也完全是异曲同工。

那么，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及经济发展是如何启动的呢？经济学家同样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加以观察。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和用何种方式来配置资源，是关乎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已充分证明，民营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红利”。概括地说，民营化和市场化可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民营化和市场化构成了经济制度变迁，工业化

和城市化构成了经济发展。因此，结论自然是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的角度，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动因问题。培刚先生提出的影响工业化的发动和限制的“五大因素”，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制度——人和物的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对于“社会制度”因素，培刚先生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可能是发动因素，也可能是限制因素，必须视制度是否适应不同国家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条件而定。尽管在展开研究中，培刚先生特地指出，在他当年的有关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分析中，制度被视为是“给定的”。但是，在45年后，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时，培刚先生挑明了“给定的”制度的内涵。他明确地指出，当年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体现了自己的市场经济观，因为从《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全书的分析是以竞争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我的市场经济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同时，在张培刚先生所提出的发动和限制工业化的“五大因素”中，也包括了“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这一重要因素。

培刚先生不仅从经济学的“经济人”基本假设的理论视角，阐述了“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动机”的企业家和“企业家创建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从中外经济发展历史的视角，论证了工业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创建精神”在工业化发动中“所具有的基本重要性”。这一分析结论，同样地也已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所实证。

《农业与工业化》的再版，给了更多人重读经典的机会。经典的解读，可以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不同视角展开；通过解读经典，也会有助于人们去更好地反思历史，改造现实，创新理论。这就是一部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本身存在的意义。 ■



2014年10月17日，山东滨州，农民在无棣县鑫嘉源现代农业示范园内抢收水稻。